

夏族兴起于古河济之间的考古学考察

沈 长 云

提 要：通过对考古发现的古河济地区中心即今濮阳龙山古城聚落群的考察，可证濮阳即文献所称禹都阳城。整个豫东鲁西自仰韶至龙山时期聚落的急剧增长以及大批龙山古城的涌现，说明了以夏后氏为首的夏族在这一带的兴起。通过古河济地区聚落的骤兴与相邻豫西、关中等地聚落的衰退相对比，结合古代中原气候环境的变迁及相应人口结构变化，更显示出古河济地区在虞夏之际已发展成四方辐辏、聚落繁庶的经济文化中心。

关键词：夏族 禹都阳城 古河济之间

关于夏族的起源，是历史学与考古学共同关注的重大课题。它牵涉到中国第一个国家夏的建立，在当前史学界与考古界共同参与的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然而，这个问题在学术界又是一个长期争论不决的问题。仅近代以来，各位古史专家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就十分分歧，归纳起来主要有三说，即豫西说、晋南说和古河济之间说。还在 20 世纪初，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就曾提出：“夏自太康以后迄于后桀，其都邑及他地名之见于经典者，率在东土，与商人错处河济间盖数百岁。”^① 20 世纪 30 年代初，“古史辨派”大家顾颉刚亦曾表示过与王国维大致相同的观点。虽然他对禹的看法与众不同，说禹是天神，与夏没有关系，但并不否认夏的存在。其在 1933 年所写的《春秋战国史讲义》考证了文献所提到与夏有关的地名后指出：“夏王国的政治中心在河南，他们的势力范围，大部分在山东，小部分在河北、山西。他们享有了黄河的下游和济水流域的全部。”^② 与他们的观点相对立的是傅斯年的说法。他在同年发表的《夷夏东西说》中，将夏商周三代先后出现的各个部族分作东西两系，认为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并据此划分以论夏域，称夏之区域“包括今山西省南部汾水流域，今河南省之西部、中部，即伊洛嵩高一带，东不过平汉线，西有陕西一部分，即渭水下游。”^③ 是其主张兼具晋南与豫西两说。但傅斯年有关夏地域的主张很快遭到杨向奎的反驳。杨向奎认为三代政治中心之所在并非永远固定在一个点上，“中夏以前，夏之政治中心在今山东，

① 王国维：《观堂集林》第 12 卷，北京：中华书局，1950 年，第 451—452 页。
② 转引自王煦华：《顾颉刚关于夏史的论述》，《夏文化研究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96 年，第 126 页。
③ 《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原载《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第 1 种，1933 年 1 月；参见傅斯年：《民族与古代中国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年，第 31 页。

其势力及于河北河南，晚夏则移居于河东及伊洛，东方仍有子遗”，^①可见其基本主张与顾、王二氏仍大致相同。当然，也有赞成传说者，徐旭生就是其中的代表，所论见于他1943年发表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②

20世纪50年代一段时间里，夏的问题较少有人提及，直到50年代末考古学界介入，学术界才开始对夏投入较多的关注。现学术界一般认为，考古界对夏文化有目的的调查与发掘，是从1959年徐旭生率队前往豫西进行“夏墟”考古调查开始的。徐旭生认为，在目前所见有关夏都邑所在的近三十条来自《左传》、《国语》及古本《竹书纪年》的史料中，只有两个区域与夏的关系特别密切，一是河南洛阳及其附近，尤其是颍水上游的登封、禹县等地，另一个即是山西西南部分水下游一带。^③这个认识无疑来自过去的傅斯年，其对日后夏文化的探索无疑也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但是，这种作用却表现为正反两方面：一方面，因为夏代后期夏人的政治中心确实移到了豫西一带，所以在这个认识指导下，人们在豫西一带发掘出了像偃师二里头这样的夏代后期的大型聚落遗址，这在某种程度上证实了夏的存在。但是，另一方面，由于他把对夏文化的探索限定在豫西、晋南一带，对于文献中所显示的夏人早中期活动的地域即豫东、鲁西一带一概忽视之，又造成大家对夏代历史文化认识上的许多空白。即如夏族的兴起及夏后氏国家的建立这类问题，由此便没有了着落。由于二里头遗址影响的巨大，一些学者干脆在二里头文化与夏文化之间画上等号，这样将考古文化与历史文化混为一谈，更难免造成一系列认识上的混乱。其实二里头文化早不过公元前1850年，夏族的兴起是前21世纪的事情，二者在时空两个方面都是扯不到一起的。

关于夏族起源晋南说，近年来曾有王玉哲、刘起舒等学者为文申论过这一主张。^④不过目前看来，此说面对的困难似乎更大一些，因为它无法解决晋南地区的二里头文化类型（即东下冯文化）的时代较晚与其主张的夏兴起于晋南这种说法之间的矛盾。不少学者认为，夏即使与晋南发生关系，也当是后来的事情。

我个人在十年前曾在王国维与杨向奎论点的启发下，先后撰写过《夏后氏居于古河济之间考》和《禹都阳城即濮阳说》两篇文章，认为夏后氏早期居住的地域在古代的黄河及济水流域之间一带，禹所都的阳城即古河济地区的中心濮阳。^⑤文章在《中国史研究》上发表后，曾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但也招致了一些学者的反对。^⑥更多学者虽然没有表示反对意见，大概心里颇不以为然。然而对于这个论点，个人至今坚持不渝者，以文献记载确实只能得出这个结论。想必多数学者，特别是众多考古学者不赞成我的论点的原因，主要是我的文章只顾及谈文献，而未提供多少考古学方面的证据。当今学术思潮讲的是考古发掘与文献资料双重证据，你拿不出考古发掘的证据，不仅缺了一条腿，还有抹煞人家考古发掘成果之嫌。因自埋头于学习与研究有关夏时期及其以前的考古发掘的资料。在此期间，我申请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国古代国家

① 杨向奎：《夏民族起于东方考》，《禹贡》第7卷第6、7期，1937年6月，第61—79页。

②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09页。

③ 徐旭生：《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考古》1959年第10期，第592—600页。

④ 王玉哲：《夏文化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夏史论丛》，济南：齐鲁书社，1985年，第1—18页；刘起舒：《由夏族原居地纵论夏文化始于晋南》，《华夏文明》第1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8—52页。

⑤ 沈长云：《夏后氏居于古河济之间考》，《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3期，第113—122页；《禹都阳城即濮阳说》，《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2期，第11—18页。

⑥ 方西生：《夏王朝中心在伊洛和汾浍河流域考析》，《武汉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第104—110页；《禹居（都）阳城考辨》，《江汉考古》1998年第1期，第66—72页。

的起源与形成研究”也鞭策我加紧这方面的研究。现在,我愿意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呈请从事夏文化研究的诸位先生审阅。作为一位历史学者,诚恳希望听到来自考古学界的批评,切磋琢磨,实现考古与历史的整合。

一 禹都阳城在濮阳的考古学观察

我过去认为禹都阳城即濮阳的论点主要有以下几则。1. 古代濮阳(在今濮阳以南)有阳城之称,先秦古籍《战国策》可为之作证;2. 此阳城所在与文献所记夏后氏兴起的崇山(今山东鄄城东南)密迩相近,这也可以通过包括《墨子》、《山海经》在内的较早文献得出结论;3. 文献盛称大禹治水,而禹治水之域主要在古河济一带的兖州,这是包括徐旭生在内的古史专家皆承认的史实。禹之治水,实主要为本部族人民的生存发展考虑;4. 濮阳又称作帝丘,为帝颛顼所居,而据诸多先秦古籍,鲧、禹及夏后氏系颛顼氏族的后裔;5. 夏初的夏后相居住在古濮阳,此在《左传》等书中有明确的记载,这是有关夏初诸王居住地的最早的文献记载。由颛顼到禹再到夏后相皆居住在古濮阳,这不是偶然的;6. 夏后氏的其他一些同姓及姻亲氏族皆居于以古濮阳为中心的古河济地区及其附近。^①

以上皆属从文献中得到的禹都阳城在濮阳的证据。我那时对考古学还不太熟悉,提不出更多禹都在濮阳的考古学方面的证据,但我始终是重视考古发掘成果的。记得当时古河济地区发现了不少龙山时期的古城,包括山东阳谷和在平发现的龙山时期的古城群、河南辉县孟庄发现的龙山古城,联系到以前在此不远处发现的安阳后岗古城、淮阳平粮台古城及偃城郝家台古城等,我曾在文章中指出,这一带发现的如此多且密集的龙山古城,应当就是文献记载的虞夏王朝或尧舜禹部落联盟所属各部落聚居的中心,既然它们都围绕在古濮阳的周围,我们凭什么说与它们处于同一地理环境的古濮阳不会有当时人们所修建的古城呢?我因而预言,“但愿不久的将来,考古工作者会揭开濮阳古城上面覆盖的厚厚的淤泥层,使这座中国最早王朝的都城重新呈现在探寻夏文化人们的面前。”^②

令人高兴的是,时隔不久,考古工作者的发掘果真将我的这个预言变成了现实。2005年11月,在我有幸参加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古文明研究中心及河南省博物院联合举行的“文明探源:考古与历史的整合”研讨会上,便传来了考古工作者不久前在濮阳的一个村子发现了东周卫国都城,并在卫都城址的下面发现有一座龙山时期古城的信息。主持这项发掘工作的袁广阔研究员在会上介绍说,这座古城是在濮阳东南约10公里的五星乡高城村发现的,高城原本叫做高阳城(高阳为帝颛顼的别称),龙山城被叠压在春秋卫国都城之下,具体位置在卫都北城墙的下面。通过简单挖掘,已发现龙山城的夯土结构,根据夯土中含有龙山早、中期的陶片,推测其建造时间在龙山中晚期。^③

近日,有关濮阳高城古城遗址的信息又进一步被刊登在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所编的《古代文明研究通讯》上面,其称遗址的夯土城是濮阳市文物保管所在2002年对该遗址进行的考古钻探中被发现的。其后,从2005年4月至2006年6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濮阳市文物保管所联合组成的调查小组对遗址再次进行调查与试掘,初步探明该遗址为一处面积约为916

① 参见拙作:《禹都阳城即濮阳说》,第11—18页。

② 参见拙作:《禹都阳城即濮阳说》,第18页。

③ 以上为笔者参加研讨会所听取的袁广阔研究员的发言记录,未经本人审定,但基本内容不会有误。

万平方米的古城址。这 916 万平方米当是春秋战国时期卫国都城面积。从古城某些部位的叠压情况看，其产生的时代当更早。其中，在该城北城墙西部至中部所开挖的 T1、T2、T3 三个探方中不同时期的夯土内，都出土了较多龙山时期的陶片，结合西墙北部钻探及南墙小面积试掘也都探出过龙山陶片的事实，可以判断这里曾经存在过一处面积较大的龙山文化遗址。对于春秋卫都下面叠压的更早时期的夯土城的年代，目前虽无法最后确定，但由 T2 内分布于最内侧的夯土呈深灰色、夯层内无夯窝且分层较厚，并其被外侧所有夯层叠压、地层叠压关系最早、夯土内含有较多龙山早期或仰韶晚期陶片、其他陶片亦不晚于龙山时期等现象看，可以断定此探方内的夯土时代最早。文章最后在谈到高城遗址发现的意义时指出，有关“文献记述和传说中的帝丘及卫国都城，应当就是现今所发现的高城遗址，它不仅为研究卫国历史提供了可靠的资料，同时也为研究五帝之一的颡顓以及夏商历史提供了重要线索。”^①

袁广阔及有关先生在北京大学所编《古代文明研究通讯》上所发表文章的介绍和分析都比较客观，结论也是不错的，但有一点不足，就是没怎么涉及这座龙山古城与夏的关系（《通讯》上文章有一句谈到濮阳“也是夏后相的都城”）。其实，从文献与考古的结合看，我们更应该考虑到它是夏初的一座都邑，很可能即是禹所都的阳城。一则，古濮阳有阳城的名称；二则，该城的年代属龙山中晚期，其下限与人们认定的夏初纪年正相符合；三则，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的结合在这座古城的性质判断上体现的更加密切。上引《左传》僖公三十一年记载卫成公梦康叔曰，称“相夺予享”，不仅表现了这里曾经是夏后相居住的一座城邑，而且表现了春秋卫都是在过去夏都旧址上兴建的事实，这与考古发现春秋卫都叠压在龙山城之上的现象若合符节。至于学者称它为颡顓所居的帝丘，也不与我们认濮阳为禹都阳城的说法相冲突。如前所述，文献记载鲧禹实为颡顓的后裔，如称“颡顓产鲧，鲧产文命，是为禹”，^②或称夏后氏“祖颡顓而宗禹”，^③或称“颡顓五世而生鲧，鲧生高密，是为禹”。^④或许是颡顓氏修建阳城在先，禹和夏后相接又把它充作了自己的都城。

除濮阳龙山古城的发现外，考古发现的龙山时期濮阳一带的聚落群也能提供濮阳作为夏初都邑的证据。实际上，对于龙山时期濮阳一带在聚落形态上特别突出的地位，是由许顺湛最早提出来的。1987 年，濮阳西水坡发现了仰韶时期三组蚌砌龙虎图案，一时引起轰动，有关方面随即举行了“龙文化与中华民族”的学术讨论会。2000 年，这里举行第二次学术研讨会，许顺湛出席会议并提交了论文，然而论文的题目却是《濮阳龙山聚落群的启示》，^⑤内容不是谈龙文化，也不是谈仰韶时期的濮阳，而是谈龙山时期的濮阳，他感到濮阳一带龙山时期的聚落群是值得研究的事情。

据许顺湛的介绍，龙山文化遗址在濮阳市所辖各区县的分布并不平衡，其集中分布的地区主要是在濮阳县周围，这里连同濮阳市区共发现了 20 处龙山聚落，加上西边滑县与濮阳靠得十分近的 21 处聚落，组成了一个总共包括 41 个聚落的大聚落群，其中的中心聚落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发现有龙山城的濮阳五星乡高城遗址，其面积竟达到 100 万平方米。按照许顺湛对聚落规

①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首都师范大学、濮阳市文物保管所：《濮阳高城遗址考古新发现》，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研究通讯》第 33 期，2007 年 6 月。

② 《大戴礼记·帝系》。

③ 《礼记·祭法》。

④ 《世本·帝系》，雷学淇辑校本，载《世本八种》，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 年。

⑤ 许顺湛：《濮阳龙山聚落群的启示》，载《2000 濮阳龙文化与现代文明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中国经济文化出版社，2003 年，第 189—191 页。

模的层次划分,整个濮阳聚落群的结构如下:

特级聚落1处:濮阳县五星乡高城遗址,100万平方米。

一级聚落1处:濮阳县子岸乡文寨遗址,40万平方米。

二级聚落2处:市区南戚城村遗址,15万平方米;濮阳县子岸乡齐劝遗址,10万平方米。

三级聚落37处:均在9万平方米以下。

从聚落群的这种规模与层级结构出发,许先生提出各小型聚落(三级聚落)应是一些氏族部落的居地;二级聚落可能是“邑”一级的中心遗址,特级聚落和一级聚落应考虑是古国的国都遗址。如是,濮阳聚落群显示了一个“都、邑、聚”结构齐全的古国或古代酋邦的存在。

当许先生这篇论文发表的时候,濮阳高城尚未进行正式发掘,人们并不知道高城遗址下面覆盖着规模庞大的春秋卫国都城及其更下面的龙山古城,但许先生已从该聚落群的不同寻常的规模及周围地区的考古发现感觉到这一带地下可能有这样一座龙山古城,他说:

与濮阳紧临的山东阳谷发现有古城,在安阳的后岗、辉县的孟庄、新密的古城寨、淮阳的平粮台等地,都发现了龙山时期的古城。这就是说在濮阳龙山聚落群的四周都有同时期的古城发现,说明当时的社会并不安全,各部族之间并不是和平共处,都有防御设施。但是濮阳这样一个庞大的聚落群,具有古国性质的大聚落群,居住在四面强敌之中,没有防御设施是不可理解的。因此,不排除在濮阳龙山聚落群中发现古城的可能性。^①

笔者过去也曾提出濮阳地区应该有古城的设想,这个设想除了依据文献有关夏初虞夏诸部在这一带活动的记载外,也考虑到了濮阳四周发现龙山时期古城的情况。^②此见考古学者与历史学者可谓不谋而合。所不同者,许先生主要是考虑到了古代濮阳与帝颛顼的关系,我则除了考虑到帝颛顼在此居住外,更多地考虑到了夏后氏也在这里居住过,考虑到禹都阳城与濮阳的关系,以及《左传》有关夏后相的居地就是以后的卫都濮阳的记载。

现在结合新近发现的濮阳龙山古城,再来分析濮阳龙山聚落群所包含的历史意蕴。不妨先将濮阳聚落群与中原同期其他聚落群做一番比较。

针对学术界不少人认为禹都阳城在今河南登封的看法,笔者曾经指出过河南颍川地区的登封阳城不能认作是禹都的理由。因为这里距离夏兴起的崇山位置过远,被人认作是崇山的今登封市的嵩山或嵩高山先秦时期只称作太室山或外方山,而未有崇山的名称。另外,这里的地势环境也与禹治洪水之事不相干连,我们不能设想一个与洪水发生没有关联的地方的部落首领会领导民众进行大规模的治水活动。并且文献记载当时一些著名的氏族部落都不在这个地方。而今我们从聚落考古的角度观察,这里不能视作是禹都的理由或许更为充分,因为这里龙山时期的聚落遗址的数量和规模并不十分突出,在与河南各地同期聚落群的比较中只能算作一般,不能体现出王都气象。^③在这一点上,濮阳聚落群明显比登封具有优势。我们查阅了河南龙山时期

① 许顺湛:《濮阳龙山聚落群的启示》。

② 参见拙作:《禹都阳城即濮阳说》,第17—18页。

③ 按许顺湛据杨育彬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的统计,登封市所辖各乡镇只有13处龙山时期的聚落(包括王城岗所在的八方聚落遗址),其中没有一级聚落,二级聚落只有一处(10万平方米),余皆为9万平方米以下的小聚落。(《五帝时代研究》,第254页)不过,近年来,经考古工作重新探索,这里聚落的数量和规模都比过去有所扩大,其中在王城岗小城迤西发现了据说有30万平方米的大城,遗址面积也被重新估定为50万平方米(《考古》2006年第9期:《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2002、2004年发掘简报》)。然这些新发现尚存有一些疑问,所谓“大城”实际只发现了其北面的一段墙体。即令新发现的这些数据属实,登封龙山聚落群也只能是一个势力不大的群体。

所有聚落及学者所划分的各个地区聚落群的资料，可以看出，像濮阳聚落群这样包含有如此众多的聚落，其中心聚落达到如此大面积的规模并同时建有古城，其下属各聚落的等级划分又如此分明的河南龙山时期考古发现，似乎再找不出第二个。

从聚落群所包含的聚落数及其内部结构的比较上看，如以许顺湛提供的河南省各地龙山时期聚落群的划分做依据，^① 可知河南各地只有确山聚落群（位于豫南）一地的聚落数（46处）超过了濮阳聚落群。但这个聚落群却没有大型聚落，其最大的一处聚落驻马店市郊的刘阁乡党楼遗址只有17.5万平方米，仅及许氏的二级聚落标准，余皆为不及10万平方米的小型聚落，是其尚未形成“都、邑、聚”的金字塔形聚落结构。在这一点上，其与濮阳聚落群不可同日而语。濮阳聚落群拥有超过40个以上的聚落，又各大中小型聚落的金字塔形结构层次分明，这是其他聚落群无可比拟的。

若比较各聚落群中心聚落的规模，濮阳五星乡高村聚落遗址亦不让同时期中原地区任何一处聚落遗址。查阅有关资料，知河南全省龙山时期上百万平方米的遗址只有两个，一是三门峡市郊的小交口遗址，其面积240万平方米，为陕县聚落群之首，也是同时期河南、山东两省最大的聚落遗址；另一个即是濮阳五星乡高城遗址。但遗憾的是，三门峡小交口遗址未曾发现有城址，这个地区的其他聚落遗址也未发现有城。濮阳五星高城聚落遗址的面积据过去的估计为100万平方米，在河南省所有聚落遗址中排第二位，虽不及三门峡小交口遗址，但它建得有城。目前，濮阳城的考古发掘工作尚未结束，我们无法得知春秋濮阳城下面压着的这座龙山古城的准确数据，仅凭估计，其规模应不会太小，或许会是目前河南山东两省发现的龙山古城中最大的一座。我们看目前已经公布的河南省发现的龙山古城与其所在遗址面积之间的比例关系，一般是城址面积约占整个遗址面积的一半左右，或稍多一点。如偃城郝家台，城址面积3.28万平方米，所在遗址面积6.5万平方米；新密古城寨，城址面积17.65万平方米，所在遗址面积27万平方米；淮阳平粮台城址与所在遗址面积均为5万平方米；辉县孟庄，城址面积12万平方米，所在遗址面积近30万平方米；登封王城岗，城址面积30万平方米，所在遗址50万平方米（据新的发掘与调查数据）。此外，最近发掘的焦作徐堡龙山古城，其城圈的面积与所在遗址的面积分别为20万平方米及40万平方米，也是前者占后者的一半。^② 按照这个比例关系，濮阳龙山古城的面积至少应在50万平方米以上，为河南、山东两省所发现龙山古城之首。当然这只是一个大致的估计，高城龙山遗址100万平方米的面积也是一个大致的估计。从上述高城遗址的发掘情况看，可能实际情况要比这更大一些，作为一个王朝的都城，尽管它处在王朝的初期阶段，50万平方米的规模还是小了一点。我们期待着考古发掘的最终结果。

总之，从濮阳发现的古城址及濮阳聚落群的聚落数量、规模与层级结构看，濮阳可视为夏初禹所都的阳城，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二 从聚落形态的发展变化看夏共同体在古河济地区的兴起

以上只是对夏后氏居住在濮阳地区的分析。但夏后氏只是夏共同体的一个氏族，是这个共同体占统治地位的酋邦，并不等于整个夏族，夏共同体或曰夏族是以夏后氏为首的多个与夏后氏同姓及与夏后氏通婚的氏族部落组成的，如人们所熟悉的有扈氏、有莘氏、斟灌氏、斟寻氏、

① 许顺湛：《五帝时代研究》，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40—264页。

② 《河南焦作徐堡发现龙山文化城址》，《中国文物报》2007年2月2日。

有仍氏、有虞氏之类。它们都围绕着夏后氏所居的古濮阳城,居住在古河济地区及其附近。^①那么,考古发掘资料能否提供整个夏族共同体在古河济一带兴起的证据呢?这需要从古河济地区及其附近聚落形态的发展变化谈起。

古河济之间及其附近地区主要指今豫鲁交界一带,包括今豫北及豫东的一部分地区、鲁西南及鲁西的一部分地区。今天这一带整个都是平原地形,属于由黄河冲积而成的华北大平原的一部分。由于它处在东面的泰蒙山地及西面的太行山地两个高地之间,地势十分低洼。又由于黄河下游河段及其众多支流在这里流过,造成境内河网密布,湖沼池泽众多的自然环境。特别是在远古时代,气候较今湿热,这种河流湖沼众多的地理环境更显突出。仅鲁西南的菏泽地区,见于先秦两汉文献记载的湖泽就有大野泽、孟渚泽、雷夏泽、菏泽、蒙泽等,流经这一地区的河流则有古河水、古济水、古濮水、古濰水、古沮水、古菏水以及其他一些小的河流。由于地势低洼及水网过于密集,古代地质沉积过程又十分缓慢,因而远古时期这一带基本上是人类无法居住的。直到仰韶文化及大汶口文化时期,这里除少数地势较高的土丘之外,多数地区仍少有人居住。以是,这里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遗址异常稀少,仰韶文化及大汶口文化时期的遗址亦不算多。在豫北属于古河济之间范围内的濮阳县及濮阳市郊一带,只发现有5处仰韶时期的聚落。聚落的规模亦小,濮阳市郊的戚城村遗址算是这一带最大的仰韶聚落,其面积只有15万平方米。此与龙山时期这一带聚落密集的情况自不可同日而语,就是比起同时期河南省其他许多地区,如豫西、豫中、豫南一些地区仰韶聚落繁庶的情况,亦差之甚远。豫东的情况与豫北相类似,尤其与鲁西南接壤的开封市及商丘市两个辖区,加起来亦不到10处仰韶文化遗址,并同样均是小型遗址,构不成聚落群。^②位于鲁西南的菏泽地区亦是同样情形,有关文章介绍这里只有8处大汶口文化遗址,且均属大汶口文化的晚段。^③菏泽以北与冀豫两省交界的山东聊城地区,大汶口时期的遗址亦不算多,如发现有众多古城的茌平周围地区,只发现有6处大汶口文化遗址,而发现的龙山时期的遗址则多达30余处。另一个以发现多处龙山城著称的聚落群阳谷县周围,也只发现有4处大汶口文化遗址,发现的龙山文化遗址为19处。^④总之,整个豫东鲁西古河济之间及其附近地区,直到仰韶—大汶口文化时期,尚处于人口较少,聚落不发达的状态,这是可以下断言的。

然而到了龙山时期,这一带的面貌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各个地方的聚落一下子增加了许多,遗址规模变大。尤其作为史前聚落最高形式的城址接踵拥现,城址的密度与规模超过了中原其他地区,还有成组的城址出现,成为本地区龙山文化的一大亮点。

目前这一带的龙山古城主要发现在鲁西聊城地区,共两组8座城址。一组在阳谷县,以景阳岗古城为中心,包括其附近的皇姑冢古城和王家庄古城。其中景阳岗古城的面积达38万平方米,^⑤位于阳谷县东南张秋镇景阳岗村周围;皇姑冢古城在它的东南方向8公里处,面积约6万平方米;王家庄古城在景阳岗东北约10公里处,面积约4万平方来。^⑥另一组发现在茌平及其

① 沈长云:《说“夏族”——兼及夏文化研究中一些亟待解决的认识问题》,《文史哲》2005年第3期,第61—68页。

② 参见许顺湛:《五帝时代研究》,第226—228页。

③ 陈洪波:《鲁豫皖古文化区聚落分布与环境变迁》,《考古》2007年第2期,第48—60页。

④ 参见张学海:《论山东地区的龙山古城》,载《鲁西文博论丛》,济南:齐鲁书社,2000年,第43—44页。

⑤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阳谷县景阳岗龙山文化城址调查试掘》,《考古》1997年第5期,第11—26页。

⑥ 参见张学海:《论山东地区的龙山古城》,第30—31页。

附近的东阿县，包括教场铺古城、尚庄古城、大尉古城、乐平铺古城和王集古城。其中教场铺古城的面积稍大，约为5万平方米。^①在其北面19公里处的尚庄古城3万余平方米，东北3公里处的大尉古城3万平方米，东北6公里处的乐平铺古城3500平方米，东南3公里处位于东阿县境内的王集古城3.7万平方米。^②这两组古城中，尤以景阳岗古城最为引人注目：不仅其面积远大于其他古城，且其内部的结构非同一般：城内筑有一大一小两座夯土台址，大者面积达9万平方米，小者约1万平方米。学者推断前者为宫殿基址，后者为祭祀建筑基址。它应当是当时一座古国或酋邦的都邑。

像阳谷、茌平这样以成组形式出现的古城址，在国内龙山时期的聚落考古中，是从未有过的。城址的数量与密集程度，在国内各个地区也是首屈一指的。就景阳岗这座古城的规模与其内部结构而言，除了山西陶寺遗址以外，也少有哪个地方的古城可与之比肩。其潜在的历史意蕴，还有待深入探讨。^③其实不仅聊城的这两组古城，将眼光再放大到整个古河济地区，这里发现的古城址的规模与数量也是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上文已经谈到濮阳发现有龙山古城。鲁西南的菏泽地区，据张学海先生介绍，也有曹县的春墓岗及定陶的仿山两处古城，只不过未曾发掘而已。^④再加上稍远一点的位于豫北安阳地区的后岗龙山古城及新乡辉县孟庄古城，整个古河济地区共有13座龙山城，真可称得上是国内古城址最为集中的地带。这些古城都围绕着濮阳这个夏初的帝都，其距濮阳的直线距离，远不过一百多公里，近者只有几十公里。如此情况的布局意味着一个什么样的政治格局，应是不言而喻的。

除古城址外，一般龙山时期的聚落在这一带的密集程度也是令人瞩目的。尽管这一带许多地区由于处在日后的黄泛区，历来的洪水泛滥使不少古代遗址被淤泥湮埋于地下以至未能被发现，但仅就已发现的龙山时期的遗址而言，这里聚落遍布与集中的情况已是相当可观。上面介绍的濮阳地区的聚落遗址群可以说是一个典型。除此之外，鲁西南菏泽地区龙山时期聚落的密集程度亦值得一提。据李玉凤《菏泽地区的龙山文化概述》介绍，目前菏泽地区发现的古遗址近三百处，其中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占三分之一还多。^⑤也就是说，这里新石器时期遗址的数量起码在一百处以上。这些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基本上都应是龙山时期的遗址，因为这里没有太早的新石器时期遗址，少数几个大汶口文化遗址同时也含有龙山时期的文化。笔者2006年春曾受菏泽市历史文化与中华古代文明研究会之邀，到菏泽地区考察其古文化遗址，亲自感受到该地区古文化遗址遍布的情况。这些古遗址大都坐落在一些大大小小的堦堆上面。所谓堦堆，即一些高出地表的小土丘。今天这些土丘的面积因各种历史原因已显得不是很高大，但据说过去的面积与高度却往往十分可观。如梁山县的青堦堆，在1958年时的面积就还有32万平方米。^⑥它们在菏泽所辖各个区县都有分布，尤以该地区中部的曹县、定陶、鄄城及菏泽市区为多。其土质呈灰黑色（不同于周围由黄河泛滥造成的黄砂土），正与《尚书·禹贡》所记“河济惟兖州……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等：《山东茌平教场铺遗址龙山文化城墙的发现与发掘》，《考古》2005年第1期，第3—6页。

② 参见张学海：《论山东地区的龙山古城》，第29页。

③ 张学海认为阳谷古城群与以舜为首的有虞氏的地望大体一致，可备一说。见《东土古国探索》，《华夏考古》1997年第1期，第60—72页。

④ 张学海：《山东史前聚落时空关系宏观研究——苏秉琦学术思想在山东考古的再实践》，载《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227—245页。

⑤ 李玉凤：《菏泽地区的龙山文化概述》，载《纪念山东大学考古专业创建二十周年文集》，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88—197页。

⑥ 《山东梁山青堦堆发掘简报》，《考古》1962年第1期，第28—30页。

厥土黑坟”的土质状况相同。考察所见，这些堙堆从上到下都包含有不少龙山时期的陶片，显然都属于龙山时期的遗址。也有的同时含有岳石文化的陶片，说明其同时包含有龙山文化与岳石文化的内涵。据称，这样的堙堆遗址在整个菏泽地区共有数百个，仅该会会长、时任菏泽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潘建荣先生在菏泽市政区图上为笔者标示出来的就已达 120 余处。不过，其中有些较大型的遗址似是“堙堆”这个概念容纳不下的，如上举曹县西北的春墓岗遗址，张学海先生认为那里曾经有过的几处夯土台原是连接成一线的首尾长达千余米的夯土城的城墙。如是，则这里应是一处在较为广阔而又较高的地势上建造起来的有相当规模的城址。如果说这座龙山古城址也是建造在堙堆之上的话，那么这个堙堆的面积着实可观。

对于聊城地区龙山时期的聚落状况，因目前尚无法得到所有该地区龙山遗址的统计资料，只能据其中一些个案做出估计，如上引张学海文章提到，该地区的茌平聚落群有龙山遗址 30 处，阳谷聚落群有龙山遗址 19 处。想必整个聊城地区龙山时期的聚落遗址不会在邻近的山东菏泽及河南濮阳两个地区之下的。

现在，可以对古河济地区（及其附近）仰韶与龙山两个时代的聚落遗址做一番数字比较。对于豫北，笔者选取濮阳、新乡、安阳、鹤壁四个地区做统计对象；对于豫东，选取开封、商丘两个地区做统计对象；鲁西南以菏泽地区做统计对象；鲁西以聊城下面的两个聚落群做统计对象。其中豫北及豫东的统计，都以许顺湛《五帝时代研究》所划分的聚落群下所辖聚落为依据；鲁西南及鲁西，则以上面的分析做依据。先看豫北及豫东地区，如表 1：

表 1 豫北及豫东地区聚落

地 区		聚落数	
豫北	濮阳地区	仰韶时期	龙山时期
		5	20
	安阳地区	10	35
	新乡地区	10	37
	鹤壁地区	10	42
豫东	开封地区	无	11
	商丘地区	无	36

再看鲁西南及鲁西地区（部分），如表 2：

表 2 鲁西南及鲁西地区（部分）聚落

地 区		聚落数	
鲁西南菏泽地区		大汶口时期	龙山时期
		8	120
鲁西	茌平聚落群	6	30
	阳谷聚落群	4	19

可以看出，古河济之间及其附近地区的豫北及豫东一带，仰韶时期与龙山时期聚落遗址之比是 35：187，而鲁西南及鲁西部分地区大汶口时期与龙山时期聚落遗址之比是 18：169，二者合计，整个古河济之间及其附近地区仰韶—大汶口时期与龙山时期的聚落遗址之比为 53：356。需要指出的是，上列数字仅仅表示这个地区仰韶时期与龙山时期聚落的比例关系，并不表示这个地区的所有聚落数，因为这一带尚有许多古代遗址由于历年洪水泛滥被深埋于地下而未被发现。同时，豫北及豫东一些未在作者认定的聚落群范围内的聚落亦未收集在这个数字之内。仅此而论，已能反映出龙山时期这一带人口与聚落大量增长的情况，这应当是古代夏族在这一带兴起的考古学上的有力证明。

三 气候变迁、人群迁徙与古河济地区经济文化中心地位的确立

我们说龙山时期这一带人口与聚落有了大量增加，只是表明龙山时期即夏代国家产生前后这里社会发展的兴旺程度，并不一定意味着这里的人口与聚落密度一定比其他地方要高（也不一定比其他地方低）。但是，这里人口与聚落增长的速度却是任何其他地方都不能比拟的，它反映这里是当时社会发展、经济增长最具活力的地区，是吸引人们前来进行开拓与发展的最为适宜的地方。对于这一点，同样可以列出其他一些地方的有关数据进行比较。

目前多数人们都认为中原地区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这是不错的。但所谓“中原”所指范围过大又过于笼统，到底何处是中国古代第一个早期国家的发祥地，还应仔细考究。为此，相当部分学者又将探索的眼光集中于中原的豫西地区，也就是日后二里头类型分布的伊洛汝颍一带地区。这里龙山时期的聚落不能说不发达，但是有一个根本问题，就是与过去仰韶时期的聚落相比较，这里基本上没有什么长进。也以许顺湛对这一地域所做的统计做依据，其统计出这一地域所包括的郑州、洛阳、三门峡、平顶山及许昌几个地区仰韶时期聚落群拥有的聚落数共有 449 处（郑州 80、洛阳 167、三门峡 153、平顶山 43、许昌 6），其中大型聚落（特级聚落与一级聚落）共 26 处；龙山时期这一地区拥有的聚落数为 471 处（郑州 77、洛阳 167、三门峡 141、平顶山 52、许昌 34），其中大型聚落共 24 处。一看便知道，这里龙山时期的聚落比仰韶时期并没有明显增长，其中大型聚落甚至还有所减少。

最近高江涛同学的博士论文《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的考古学研究》对上述地区两个时期的聚落分布亦进行了研究。他比较倾向于将中国第一个早期国家的地源地放置在豫西一带的，但其研究的结果却同样表明这里龙山时期的聚落较前一个时期没有什么增长。他的文章使用了“区聚落”这一概念，据称指一些较大流域内组成的聚落群，认为豫西自仰韶至龙山时期聚落遗址分布最密集也最具有代表性的区聚落有三个，即伊洛区聚落、颍河区聚落及弘涧区聚落。现将他所统计的这些区聚落仰韶时期及龙山时期的聚落表列如下（参见表 3）。

表 3 仰韶时期及龙山时期的聚落

区聚落名称	遗址总数		特大型聚落		大型聚落		中型聚落		小型聚落	
	仰韶时期	龙山时期	仰韶时期	龙山时期	仰韶时期	龙山时期	仰韶时期	龙山时期	仰韶时期	龙山时期
伊洛区聚落	229	304	5	5	24	30	31	30	169	239
颍河区聚落	94	128	1	2	3	5	14	14	76	107
弘涧区聚落	141	120	6	3	10	6	15	9	110	102
合计	464	552	12	10	37	41	60	53	355	448

从表 3 中可以看出，豫西一带具有代表性的三个聚落区仰韶时期与龙山时期的聚落总数差别并不是很大，而其中的大型聚落与特大型聚落则两个时期大致持平，中型聚落在龙山时期还有所减少，所增长者，多为小型聚落。总的看来，高江涛博士与许顺湛先生的统计提供的信息基本是一致的，龙山时期豫西一带的人口聚落较前一阶段并没有明显的增长。这与笔者前面阐明的豫东北、鲁西、鲁西南一带龙山时期聚落较前一个时期成倍、成十倍增长的情况适成鲜明对照，简直可以说是处在停滞的状态。

倘若再仔细进行分析，还可以发现豫西一些地区的人口与聚落不仅没有增长，反而有所倒退。如高江涛博士提到的弘涧区，其龙山时期聚落总数由仰韶时期的 141 处减至 120 处，尤其是其中的特大型聚落，由 6 处减至 3 处；大型聚落，由 10 处减至 6 处，几乎减了一半！我们知道，这一带本是仰韶（中晚期）聚落最为繁盛的地区之一，著名的仰韶村遗址就在这里，还有传为

黄帝所居的铸鼎原亦在这里,然而到龙山时期却走向衰落了。伊洛区龙山时期的遗址总数虽然有所增长,但其中心地区伊洛平原的聚落数却在减少,由仰韶时期的105处减至95处,高江涛博士的论文指出了这一点。^①

像豫西弘涧区这样龙山时期的人口与聚落较前一个时期衰退的地区,还有其西邻陕西关中地区。按许顺湛的统计,该地区西安、铜川、宝鸡、咸阳、渭南5个辖区仰韶时期共有44个聚落群,聚落总数为1162处,其中特级聚落32处,一级聚落39处,而到龙山时期,这5个辖区下面的聚落群只有31个,聚落总数竟减至691处,其中特级聚落与一级聚落亦分别减至15处和25处。^②我们知道,关中地区也是传统的仰韶文化的主要分布区,其聚落群及聚落的分布都较其他地区密集,然而到龙山时期,它却如此急剧地走向衰落。

于是我们发现,在整个黄河中下游范围,当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交替之际,从西到东,其聚落与人口结构发生了一次根本性的变动,西边一些传统的人口稠密区和文化先进地区的人口与聚落在急剧地减少,东边接近黄河下游一带地区的聚落与人口在急剧地增加,像是发生了一次大的人口转移。

原来笔者认为这种人口与聚落的变动只是自己的发现,然而最近读到一些学者所写的环境考古的文章,才知道学术界早有人在笔者之先揭示了史前黄河中下游一带这场聚落与人口的变动。其中曹兵武先生的文章便提到:

大约距今五千年左右,中国几乎所有史前考古学文化发达的地区(特别是中原一带)都发生了一次剧烈的文化因素的增生、分化与重新组合运动……在遗址的分布上,不少仰韶时期的遗址被废弃不用。仰韶文化的中心区域比如关中、豫西等,龙山遗址较仰韶遗址大为减少,似乎经历了一次空心化运动;而一些仰韶时期人迹罕至的地方比如豫东与山东交界之处,豫东南、鲁西南和皖西北交界之处,到龙山时代则遗迹广布。^③

另有学者的文章则更具体地指出,豫东鲁西一带是在龙山晚期聚落才空前地繁荣起来,与此同时,海岱地区过去聚落较为发达的鲁东南一带,到龙山时期则聚落发现较少,整个海岱地区的文化、经济、政治中心由鲁东南转移到鲁西、鲁西北平原一带。^④

如此看来,向着豫东鲁西一带平原低地进行人口与聚落转移的,不仅有西边原仰韶文化中心的关中、豫西一带地区,也有东边原大汶口文化时期及龙山早期聚落发达的鲁东南地区。古河济之间及其附近地区显然成了一个四方辐辏、人文荟萃、聚落繁庶的经济文化中心。

造成西、东两个方向的人口与经济文化重心向河济一带转移的原因,学者们也做了认真严肃的探讨。总的说来,这种原因可归结为自然环境的变迁:一方面,由于人们对过去某些宜居地区长期过度的开垦与利用,造成了这些地区生活资料特别是生物资料的相对紧张与短缺;另一方面,由于气候的变化,造成各地区适合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适宜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些地区在新的气候条件下提供给人类新的资源不再十分充裕,另一些原来不那么适宜于人类居住的地方,则因气候的变化,变得有利于人们的生存与发展,有利于提供给人们更多的物质资料。这后一类充满新的生机的地区,无疑便是我们所说的古河济之间及其附近地区。

① 高江涛:《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的考古学研究》(博士论文,未刊),第114页。

② 许顺湛:《五帝时代研究》,第285、328页。

③ 曹兵武:《从仰韶到龙山:史前中国文化演变的社会生态学考察》,《环境考古研究》第2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3页。

④ 燕生东:《全新世大暖期东北平原环境、文化与海岱文化区》,《环境考古研究》第3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80、82页。

根据学者研究,在距今 11000 年左右,气候由冷变暖,地质时代进入了全新世,考古学上亦随即进入了新石器时代。而从距今 8500 年开始的全新世大暖期期间,人类迎来了新石器时代文化的高度发展。尤其是在距今 7000—5000 年左右的一段时间,中国中原广大地区处在一个持续稳定的暖湿气候环境里,气温较高,雨量充沛,植物茂盛,最适宜于古人类的生存与繁衍。仰韶文化就处在这个时间段。不过,在这段时间,华北平原,尤其是在豫东鲁西一带,却因为这个时期的湿热气候,仍是一派川水横流,湖泊沼泽众多的景象,尚未完成向今天这样的自然地理环境的转化,除少数地势稍高的丘岗以外,多数地方仍不适宜于人类居住。迨至距今 5000 年左右,地球上的气候突然起了变化,整体上转向温凉干燥,气温降低,降水量减少。华北平原暨中原一带许多地方的孢粉资料表明,这些地方出现了栎等喜暖类阔叶树种减少,耐干凉的树种如松树等类植物增加的现象。喜暖湿的动物种类也减少了。同时,这种气候还导致了华北平原上湖泊沼泽的大面积萎缩,从而使得渤海湾的海浸停止,出现海平面下降,海水开始后退等一系列地质地理变化。^①

这些变化对于中国北方及中原多数地区的古人类来说,也许并非好事,它导致了这些地区资源与能源的紧张。关中与豫西一些地方当龙山时期聚落与人口的减少,据信即与此有关。但是,对于地势低洼的豫东鲁西一带,这种气候与自然环境的变化却为之带来了生机。海平面的下降,引起河流侵蚀基准面的相应下降,导致河流下切,新的河流阶地、冲积平原和河口三角洲堆积的迅速发育,更导致这些地区湖泊沼泽的大面积减少。而这一切,又都意味着人们在这一地区生存空间的扩大,意味着聚落与人口向这些地区的转移。据说,在距今前 4800—前 4300 年的龙山时代中期,气温有所回升,人类在华北平原的活动有所减少,但在距今 4200 年左右,气候又再次大幅度地变凉变干,促使这一地区的河道与海岸线基本固定下来,湖沼面积也更急剧地缩小,整个豫东鲁西变得更加适合于人类居住。^② 加上这里一望无际的平原地形及原有湖泊河流的丰富的水产资源,吸引东西两个高地的人们纷至沓来,在这片广阔富饶的土地上繁衍生息,从事垦辟,从而使该地区的人口与聚落空前迅速地繁荣起来。

总之,从气候与环境的变化促使黄河中下游一带聚落人口结构相应发生的变化看,当龙山时代的晚期,古河济之间及其附近地区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欣欣向荣、四方辐辏的经济、社会与文化的中心。这种发展趋势是当时任何一个地方不可比拟的。这与文献记载以夏后氏为首的夏族在这一带兴起,许多古代著名氏族在这一带活动,是完全相一致的,也与考古发现这里龙山时代的城邑星罗棋布,比较各地最为密集的状况是相吻合的,从而也构成了中国古代第一个早期国家在这一带兴起的历史地理背景。

四 余 论

以夏后氏为首的夏族共同体兴起于古河济一带的结论,与时下不少学者尤其是考古学者的主张发生冲突,他们主张夏自来就居住在西方,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如果说二里头文化的上限包括不了夏人早期的活动遗迹,那也应在二里头文化的前身、豫西一带的龙山文化遗址中去寻找夏早期活动的踪迹。然而,正像前面已经指出的,将一个考古文化与一个王朝的历史文

① 曹兵武:《从仰韶到龙山:史前中国文化演变的社会生态学考察》,《环境考古研究》第 2 辑,第 26—28 页;燕生东:《全新世大暖期华北平原环境、文化与海岱文化区》,《环境考古研究》第 3 辑,第 79 页;宋豫秦等:《中国文明起源的人地关系简论》,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 年,第 201 页。

② 燕生东:《全新世大暖期华北平原环境、文化与海岱文化区》,《环境考古研究》第 3 辑,第 79—80 页。

化混为一谈,不仅有违于史实,在理论上也是站不住脚的。目前国外一些学者已经对国内考古界一些学者在夏共同体或夏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之间画上等号的做法提出批评,指出这种做法已落后于国际考古学的新进展,这是值得注意的。尽管我们不同意他们中的一些人对中国历史上的夏朝采取的一笔抹煞的态度,^①但我们对于夏及夏文化的探索的确存在着理论与方法上的问题,以致授人以口实。如陈淳博士的论文所引,国际学术界像柴尔德(Vere G. Childe)这样的考古学家早已指出,完全用类型学而不用社会学因素来对待考古文化,有着把同一集团生活的不同方面划分为不同文化的危险。布鲁斯·炊格尔(Bruce G. Trigger)也认为,考古学文化概念只适合于研究小规模、相对封闭的、较为定居的史前社会,对于复杂社会,由于其社会和经济的差异会造成文化上的多元性,因而考古学文化在观察这样的社会时就会变成不适当的衡量手段。^②笔者认为,这个批评是切中要害的。前面也已指出,二里头文化与夏文化无论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是很难完全对应的。根据文献记载,组织成夏代国家的那些氏族部落(即所谓“夏族”)确实很难被编织进一个单纯的考古文化的谱系。既然说夏已进入文明社会,那么,一个已经进入文明时代的复杂社会是绝不会与一个单纯的考古文化相对应的。我们最多只能承认二里头文化所跨越的某一个时间段(如它的三四期),在它的某些地区可能包含有部分夏人活动的遗迹,而不赞成二里头文化即是夏文化这样笼统的提法。最近,李学勤先生来我校历史文化学院作演讲,也专门谈到考古学文化与古代王朝相互之间关系的问题,认为一些学者在这二者之间画上等号是不合适的。他明确表示,像岳石文化分布的一些地区,文献上明明提到了夏的一些部族在那里活动过,怎能把它们排除在夏文化的范围之外呢?

目前有关夏代历史文化的探讨,已经成了中国古代文明及国家起源研究的一个亟待突破的关键。由于我们迄今尚未发现可以肯定是夏朝留下来的文字资料,要将夏的有关历史记载,首先是它的一些基本史实考察清楚,使传说变成信史,无疑是一件任务十分艰巨的事情。这件事情当然主要应当通过考古发掘来进行。但要达到论证的目的,则必须使考古与历史研究双方有机地结合。现在,我们通过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对于夏作为一个国家规模的政治实体的存在,在认识上已经不成问题;对它存在的时间的下限,通过偃师尸乡沟商城的发掘及其与二里头遗址关系的比较,也可以说已基本清楚了。这两项认识,都是靠了文献与考古材料的有机结合。然而,对于夏代前期,尤其是夏兴起的认识还是相当模糊的,有关历史记载许多还没有得到证实。本文提出夏前期夏族活动于古河济之间,禹及夏后相所都之城在古河济地区的中心濮阳的论点,也是建立在考古资料与历史文献相互结合的基础之上的。如果要想在夏代国家起源问题的研究上把事情做得更深入和更细致,唯有使考古与历史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才能取得突破,取得令人信服的成绩。

附识:本文承蒙外审专家提出重要的修改意见,谨表谢忱。

〔作者沈长云,教授。河北师范大学历史系 050016〕

(责任编辑:王 和)

① 参见沈长云:《夏代是杜撰的吗》,《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第89—96页。

② 参见陈淳、龚辛:《二里头、夏与中国早期国家的研究》,《复旦学报》2004年第4期;布鲁斯·炊格尔:《时间与传统》,第126页。

CONTENTS

Research Articles

Present-Day Puyang in Henan Province Is the Cradle of the Xia People: An Archaeological Observation SHEN Changyun (4)

Archaeological findings have revealed an ancient city cluster of the Longshan Culture in present-day Puyang, Henan Province, the center of the ancient He-Ji (Yellow River and Jishui River) area. This provides evidence that Puyang was the Yangcheng of ancient records, Yu's (禹) capital city. During the Yangshao and Longshan period, the area covering present-day eastern Henan and western Shandong witnessed a rapid growth of settlements and particularly of ancient cities of the Longshan culture, suggesting that the Xia people headed by Yu (禹) thrived in this area. In contrast to the growth and prosperity of the settlements in the ancient He-Ji area, those in the neighboring areas such as western Henan and Guanzhong experienced a decline. That, together with climate change and consequent changes in population structure, suggests that a densely populated and prosperous economic and cultural center took shape in the ancient He-Ji area during the time of Yu (虞) and Xia.

Luoyang Prison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SONG Jie (17)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Luoyang Prison was located inside the county government office, and was administered jointly by the *si li xiao wei* (metropolitan commandant), *yin* (prefectural magistrate) of Henan and *ling* (county magistrate) of Luoyang. Large in size and with a complex administrative structure, Luoyang Prison accommodated prisoners sentenced both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by local governments, whose status ranged from aristocrats and officials of various ranks to ordinary people. The prison hence constituted one of the key factors affecting the security of the capital and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of the imperial court. The fierce struggle over the control of Luoyang prison contributed much to changes in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the late Eastern Han dynasty.

Tang Copies of Poems by Yuan Zhen and Bai Juyi Were Not Made Using Woodblock Printing

XIN Deyong (36)